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十六編 第十八冊

康雍乾三朝刻書機構研究

曹紅軍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六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18冊

康雍乾三朝刻書機構研究

曹紅軍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康雍乾三朝刻書機構研究／曹紅軍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102〕

目 2+17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六編；第 18 冊）

ISBN：978-986-322-169-2（精裝）

1. 刻書目錄 2. 清代

011.08

102002357

ISBN-978-986-322-169-2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六編 第十八冊

ISBN：978-986-322-169-2

康雍乾三朝刻書機構研究

作 者 曹紅軍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十六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5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康雍乾三朝刻書機構研究

曹紅軍 著

作者簡介

曹紅軍，男，1967年2月生，江蘇如皋人。文學博士，現為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研究員、江蘇省古籍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江蘇省圖書（群文）文博專業高級資格評審委員會委員。

歷任南京圖書館古籍編目組組長，南京圖書館學術委員會副主任。2002年受聘為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2003年受聘為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2007年5月受聘為國家林業局《中華大典·林業典》學術顧問；2011年5月受聘為南京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古籍版本目錄學、中國古代編輯出版史、印刷史研究、地方誌研究、藏書史研究及古籍鑒定等方面。歷年來先後參與撰寫並已獲出版的著作有《江蘇藝文志·無錫卷》（1997年江蘇人民出版社）、《江蘇藝文志·淮陰卷》（1997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古本戲曲劇目提要》（1997年文化藝術出版社）、《江蘇省通志稿·度支志》（2002年1月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江蘇舊方志提要》（1993年江蘇古籍出版社）等十餘部。發表論文二十餘篇。

提 要

在清代中央機構出版活動中，康、雍、乾三朝是刻書數量最多、出版成就最大的一個時期。以武英殿修書處為主體的中央刻書機構，全面繼承並發展了我國古代的刻印裝潢技術和活字印刷技術，在為統治階級鞏固統治服務的同時，也因此創造了我國古代官刻史上的一座豐碑。

其中，曹寅等人承刻欽頒《全唐詩》、《佩文韻府》二書是清初出版史上比較重要的刻書活動。二書的刊刻地均在揚州，校刻《全唐詩》成立的機構名『揚州詩局』，刊刻《佩文韻府》成立的機構名『揚州書局』，雖一字之差，實為兩次組局。

『臣工刊書進呈內府』現象是康、雍、乾時期出現在統治集團上層的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臣工們對刻書事業的積極參與，使得以『軟字精寫精刻』為標誌的『康版書』風格廣泛流傳，成為這個時代獨特的文化標誌。

發端於宋代的活字印刷技術在康、雍、乾時期第一次為中央機構出版活動所採用，並因此創造了歷史上最大的銅活字印刷工程和最大的木活字印刷工程。《古今圖書集成》和《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在出版過程中的特殊際遇和獨特工藝，賦予了其各自不同的版本特徵，二書也因此成為我國古代出版史上的經典之作。

康、雍、乾三朝的中央機構刻印書，全面反映了清盛世時期的文化政策和統治方略，是中國圖書史上一份極為厚重的珍貴資產，它對本時代的文化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今天的學術研究也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目

次

前 言	1
第一章 緒 論	7
第一節 歷代中央機構刻書活動概述	7
第二節 康雍乾三朝中央機構刻印書範圍界定	24
第二章 清代中央刻書機構考述	31
第一節 清代中央官刻書的中心——武英殿修書處	31
第二節 其他刻書機構簡述	45
第三章 曹寅與揚州詩局、揚州書局刻書活動研究	49
第一節 揚州詩局與《全唐詩》及《棟亭藏書》的刊刻	49
第二節 關於揚州詩局的命運	53
第三節 揚州書局與《佩文韻府》的刊刻	57
第四節 關於揚州詩局所刻書的商榷	62
第四章 康雍乾時期臣工刊書進呈內府現象研究	65
第一節 臣工刊書進呈內府現象之緣起	65
第二節 臣工刊書進呈內府考略	68
第三節 臣工刊書進呈內府現象與「康版」書風格的形成	77
第五章 清代中央機構之銅活字印書研究	83
第一節 陳夢雷、蔣廷錫與《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的印刷	84
第二節 清內府其他銅活字印本概述	96
第三節 關於清內府銅活字的其他相關問題	100
第六章 清代中央機構之木活字印書研究	107
第一節 《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排印源流	107
第二節 金簡與《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111
第三節 《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版本特徵	114
第四節 外聚珍及其版本鑒別	116
第五節 殿本《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目錄訂誤	119
第七章 清代盛世文化政策與中央機構出版成就	123
第一節 刻書視角下的清代盛世文化政策與統治方略	123
第二節 清盛世時期中央機構刻書成就及其影響	139
參考文獻	143
附 錄	149

前 言

古籍版本學研究是古文獻整理研究領域的重要課題之一。中國傳統的古籍版本學，無論是舊時代的藏書樓，還是新時代的圖書館，都是著眼於實物，一種一種地考證，一種一種地著錄，最後聯綴成篇，即完成使命。如果能進一步把存世古籍中有一定代表性的典籍放回到產生它的歷史環境中去，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分析其撰寫、編輯、出版的原因，考察它的出版流通對當時乃至其後的社會文化風氣產生的作用和影響，則庶幾可以勾勒出某時代文化發展的大致脈絡。在此基礎上，再回到典籍本身來從事版本類別鑒定、版本風格歸納、圖籍目錄編製等工作，就有了更可靠的基礎，結論自然也就更為精到。版本學這一學科由此也許就會更加拓寬自己的視野，深化自己的研究層次，古文獻學基礎理論建設隨之也會顯得更為豐富和完備。

正是基於這樣的初衷，本書選擇了以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中央機構刻印書作為研究對象，希望通過對這一歷史階段中央機構出版活動的分析，考察清中央機構刻書在當時歷史背景下的政治意圖；通過對具體刻書機構和代表性品種刻印過程的研究，糾正現行主要版本學著作和目錄書中的錯誤記載；通過對刻書內容和刻書風格的歸納，總結清康、雍、乾三朝的文化政策與統治方略，探求清中央機構刻書活動對有清一代刻書風氣和學術風氣的影響。

清代是中國封建文化發展到一個新高峰又急劇轉入衰落的時期，康、雍、乾三朝代表了整個清代文化的最高峰。康、雍、乾三帝都是中國歷史上有作為的皇帝，清中央機構刻書活動在皇帝的直接授意下進行，所印書大多經過皇帝的審定和撰序。這些書從內容到形式無不滲透著統治者的思想意識和藝

術情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政治需要和文化導向。清朝近 300 年間，以武英殿為中心的中央機構刻書總量已過千種，康、雍、乾三朝刊刻的總數計有 500 餘種，佔有清一代中央機構刊書總數的一半以上。僅乾隆一代，刻書約 350 餘種，居清代諸帝之首。許多聞名於世的鴻篇巨製大多出自這三朝，如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銅活字印刷工程——《古今圖書集成》的刊印、最大的木活字印刷工程——《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刊印都在這一時期。選取這一時段的出版物作為研究對象，對於整個清中央機構刻書活動研究來說最具有典型意義。

關於以武英殿為主體的清代中央機構刻書活動研究約始於清中葉以後，金埴《不下帶編》、于敏中等《國朝宮史》、慶桂等《國朝宮史續編》、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嵇璜等《皇朝文獻通考》以及昭槤的《嘯亭雜錄》、章鈺《清史稿藝文志》等都有著錄和評介。然而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則是在清亡以後，民國著名藏書家陶湘先生傾四十年的精力致力於收藏殿版書中的精品，並潛心研究，著有《清代殿板書始末記》，認為「殿板書其寫刻之工致、紙張之遴選、印刷之色澤、裝訂之大雅，莫不盡善盡美。」〔註 1〕陶湘還編有《清代殿板書目》、《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等目錄書，至今仍為學者所用。

五、六十年代期間，趙萬里、張秀民、蔣復璁、胡道靜等人都有專文論述了清中央機構刻書的相關問題，其中以張秀民先生的貢獻最大，其《中國印刷史》、《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二書中都以重要篇幅論述了清中央機構刻書活動。

八十年代以來，從事於以武英殿為主體的清代中央機構刻書活動研究的人日益增多，研究成果在廣度和深度兩方面都有體現。

從廣度上講，主要表現為目錄書的編撰工作。自陶湘《清代殿板書目》問世以後，一直有人在致力於殿版書目的增補工作。李致忠先生在《歷代刻書考述》一書中，附有他自己收集的《清代內府刻書一覽表》，計有單刻 633 種，54026 卷。故宮博物院和遼寧省圖書館是全國收藏內府書最多的兩家單位，他們聯合編撰了《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一書，該書是目前收錄清中央機構刻書最全的著作，計有經、史、子、集、叢各類書 1129 種。據筆者與遼寧省圖書館同行瞭解，實際數量還不止此，他們近年又發現了一批清中央

〔註 1〕 陶湘，《清代殿板書始末記》，《武進陶氏書目叢刊》，民國二十二年（1933）鉛印本，第 4 頁。

機構所刻書，正計劃出補編。

從深度上講，主要體現在局部問題的研究方面。近年來，不少學者對武英殿修書處、揚州詩局等具體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謝國楨先生在《從清武英殿談到揚州詩局刻書》一文中（《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1期）探討了「康版」書風格和曹寅刻書問題；潘天禎先生《揚州詩局雜考》一文（《圖書館學通訊》1983年1期）對曹寅在揚州奉旨刊刻《全唐詩》的活動進行了微觀而細緻的辨析；金良年先生《清代武英殿刻書述略》一文（《文史》第31輯）從經營手法、技術手法等角度對武英殿修書處這一機構流變進行了梳理；……翁連溪、朱寶虹、楊玉良、王鍾翰、李海生、李明傑、竇秀豔、周蓉、韓文寧等人都在清中央機構刻書的具體問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些研究成果都是我們可以借鑒的重要資源。李致忠先生在《歷代刻書考述》中，黃愛平先生在《〈四庫全書〉纂修研究》中，以及臺灣學者吳哲夫、昌彼得等人在各自的著述中，均以重要篇幅探討了清內府刻書、《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等相關問題，體現了當今這一領域所達到的高度。

迄今為止，對於清中央機構刻書活動，從機構沿革到品種辨析，從版刻風格到刻書影響的全面考察尚進行得不夠，這一類的專著尚未出現。本書正是針對這一闕略所作的一種嘗試和努力。

全書共分爲七章。

第一章緒論部分，系統縷述了自印刷術發明以來歷代中央政府的刻書活動，對本文的研究對象進行了範圍界定和意義揭示。

第二章爲機構研究，重點考述了清代中央官刻書的主要承擔者——武英殿修書處的機構沿革、機構組成、刻印流程、書籍裝潢及流通發行等方面的情况。對其他相關的中央刻書機構亦作了簡要介紹。

第三章詳細辨析了曹寅等人在揚州承刻欽頒書籍的活動，認為校刻《全唐詩》成立的機構名「揚州詩局」，刊刻《佩文韻府》成立的機構名「揚州書局」，二者雖一字之差，實爲兩次組局。並對相關著作中對揚州詩局的評述提出了商榷意見。

第四章對康、雍、乾三朝在統治集團上層領域出現的「臣工刊書進呈內府現象」進行了梳理和研究，闡明了這一特殊文化現象出現的緣由和過程，並對「康版書」風格形成原因進行了較為客觀的分析，澄清了相關著述中的模糊認識。

第五章專論清代中央機構之銅活字印書活動，重點考察了《古今圖書集成》一書的印刷過程。認為今本《古今圖書集成》是陳夢雷所主持印刷者與蔣廷錫所主持印刷者的复合體，其中陳夢雷所印佔了絕大部分，蔣廷錫對部分文字進行了校改，其校改方式是對原印樣挖補鈐蓋。《古今圖書集成》的特殊際遇，賦予了它不同於它書的版本特徵。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跟雍正皇帝對《古今圖書集成》的保全之心有著很大關係。現行主要版本學著作中的通行觀點多是不全面或不正確的。

第六章專論清代中央機構之木活字印書活動。詳細考述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排印源流，評價了金簡《武英殿聚珍版程序》的貢獻，歸納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版本特徵，總結了「內聚珍」、「外聚珍」在版本鑒別上的主要差別，並對相關目錄書的記載進行了糾偏訂誤。

第七章從中央機構刻書這一視角，總結了清「康乾盛世」時期的文化政策與統治方略，評價了康、雍、乾三朝中央機構刻書活動所取得的成就，並簡要分析了其對有清一代學術活動所產生的影響。

本書在研究和撰寫過程中，注意充分利用已公佈的宮廷奏摺和清宮檔案資料，認真學習和借鑒前人的經驗，綜合運用版本學、目錄學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知識，力爭做到宏觀把握與微觀研究相結合，文獻考辨與理論探討相結合，注意在史學理論的指導下，得出合理、科學的結論。

本書稿的價值大致體現在以下諸方面：一、對於清代出版史研究來說，本文解決了一些具體問題，如對於「揚州詩局」、「揚州書局」刻書活動的辨析，對於「臣工刊書進呈內府現象」的歸納，對於「康版書」風格形成原因的分析，對於《古今圖書集成》刷印過程的研究，對於「內聚珍」、「外聚珍」的鑒別等方面，本文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得出了一些新的結論。有助於澄清學界在這些問題上的模糊認識。二、對於清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來說，本文全面考察了康、雍、乾三朝的中央機構刻書活動，並從刻書這一視角歸納了清代盛世文化政策和統治方略，對相關學科的研究將起到間接或直接的推動作用，對思考盛世時期的文化發展亦具備一定的借鑒意義。三、對於古籍版本學自身發展來說，本文所採用的結合相關歷史背景的群書分類研究方法，較之於傳統的個體實物考證，是一個改變，有助於深化版本學、目錄學的研究層次，推動古文獻基礎學科的進一步發展。

由於清宮檔案尚沒有完全公佈，筆者學力所限和時間諸因素，本文的部

分結論尚有待存世實物和相關材料的驗證。筆者相信，伴隨著新材料的不斷發現和新理論的指導、新方法的運用，21 世紀的古籍版本學研究和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必將能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第一章 緒 論

在中國古代出版史中，歷朝歷代的中央機構所刻書處於一個獨特的位置。伴隨著印刷術的發明、應用和推廣，在我國古代逐漸形成了家刻、坊刻、官刻三大刻書系統。在這三大刻書系統中，家刻從個人興趣出發，帶有一定的「求名」、「積德」性質；坊刻視社會需求而抉擇刻書品種，「逐利」為其主要目的；官刻則著眼於鞏固統治、發展社會、教化臣民，「輔政」是其主要功用。從其對社會文化發展的影響來看，官刻書所起的作用是家刻與坊刻所無法比擬的。歷代中央機構所刻書是官刻書系統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處於整個官刻書系統的最頂端。它們的產生往往跟最高統治者的統治方針息息相關，是統治者很重要的一個輔政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充當著統治者的喉舌和輿論工具，規範、引導並制約著本時代社會文化的發展方向，使得本時代的大多數知識份子得以在統治者認可的範疇內窮其心智，推陳出新，創造本時代的學術文化輝煌。對中央機構刻書活動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對於認識、瞭解我國古代社會的發展歷程，把握時代社會文化發展的脈絡，考察鞏固政權與社會文化發展的相互作用與影響，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一節 歷代中央機構刻書活動概述

印刷術的發明是中華民族推動人類文明進程的劃時代貢獻。它的起源，應該是一個逐步發展，經過很多人長期試驗後，並不斷改進、完善的過程。錢存訓先生在《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中認為：「在印刷術發明以前，中國複印文字的技術已很久遠，如以印章印在泥土和紙上，以縷花版在紡織物和紙

上取得重複的文字和圖案，和在石碑上拓取碑文等。這些方法都是雕版印刷術發明的先導。」〔註1〕最初的雕版印刷術應該出現在民間，是勞動人民在長期社會實踐中智慧的結晶。佛教徒和印刷術的發明有著很大的關係，因為宗教作品需要大量的複本加以傳播。這從現存最早的印刷品多數為佛經就可得到驗證。在雕版印刷術發明初期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人們對它的優點並沒有充分認識，這門先進技術僅限於印印佛經、曆書和一些小部頭的雜書，大量的圖書製作還是採用傳統的傳抄方式。只有當這項發明由民間傳入官府，尤其是國家最高權力部門——中央機構採用這項技術大量從事圖書製作活動之後，印刷術對保存和傳播人類文化的作用才得到充分顯現。由此衍生出來的刊刻、裝幀、買賣、鑒別、校勘、目錄、收藏、保護等一系列活動，也因此得到長足的發展。中國歷代中央機構刻書活動實踐向我們展示的正是這樣一個歷程。

一、唐代中央機構刻書活動

唐代是我國雕版印刷的初創時期。在現散存於世界各地的唐代印刷品實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數種。

1. 武則天長安四年（704）至唐玄宗天寶十年（751）之間刻印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咒》。該卷於1966年在南朝鮮慶州佛國寺釋迦塔內發現，文中有武后當朝時所創造使用的若干新字。應是在中國刻成後，傳入朝鮮。
2. 武則天時代（684～705）刻印的《妙法蓮花經》。該卷內容為分別功德品第十七。吐魯蕃出土，現藏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經中有武則天時所造新字，日人長澤規矩也斷為武則天時印刷品〔註2〕。
3. 唐至德二年（757）以後成都卞家雕印的《陀羅尼經咒》。該書1944年於成都市唐墓中出土。首行鐫「唐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近卞家印賣咒本」。現存中國歷史博物館。
4. 唐至德二載（757）以後雕印的漢文《陀羅尼經咒》。20世紀70年代陝西唐墓出土，現藏陝西省博物館。

〔註1〕 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

〔註2〕 長澤規矩也，《和漢書の印刷とその歴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92年版，第5～6頁。

5. 唐咸通九年（868）王玠雕印的《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爲口口二親敬造普施」一行。敦煌發現，現藏大英圖書館。
6. 唐乾符四年（877）雕印具注曆。原出敦煌，現藏大英博物館。
7. 唐中和二年（882）成都樊賞家雕印具注曆。敦煌發現。首行鐫「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曆」；第二行鐫「中和二年具注曆日凡三百六十四日太歲壬寅」。現藏大英圖書館。
8. 唐上都東市刁家雕印曆書。原出敦煌，首鐫「上都東市大刁家太郎」。現藏大英圖書館。
9. 唐雕印《二十四孝押座文》。敦煌發現，現藏大英圖書館。
10. 唐雕印《陀羅尼經》。原出敦煌，現藏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

另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有」字 9 號《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寫本殘卷卷末有「西川過家眞印本」七字，表明西川過家在唐代雕印過《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所有這些在現存實物的不同部位出現的「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近卞家」、「王玠」、「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上都東市大刁家」、「西川過家」等字樣向我們傳遞了這樣一種信息：在印刷術發明初期，這項技術主要在民間流傳，從事印刷業的主體是民間人士，政府對這項發明的重要性還遠沒有認識到，至少在現存早期印刷品實物中，沒有一件有確切證據表明它是由政府組織雕印的。

那麼，當時的政府是否已經注意到這項發明，並在某些局部領域有所嘗試呢？從相關文獻記載來看，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十二月四川東川節度使馮宿上了一道《禁版印時憲書奏》，文曰：「準敕禁斷印曆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台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曆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註 3〕奏上，不久得到批准，太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丑，敕諸道府不得私置曆日版。」〔註 4〕這段史料向我們揭示了唐太和間四川民間大批雕版私印曆書出售的事實。時憲書在古代農業社會裏跟人民的生活密切相關，有助於掌握農時，發展生產。但在科技不發達的古代，如果任由民間私自推算，往往算錯，徒增紛亂。《唐語林》

〔註 3〕 董誥等，《全唐文》，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廣雅書局刻本，卷 624，第 9 頁。

〔註 4〕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版，第 563 頁（本紀第 17，文宗下）。

卷七中就有因曆書節候不同，互相爭執而打官司的記載〔註5〕。所以在古代社會裏，時憲書的發行權一直是中央機構獨攬，直至明清也是一直由欽天監獨家印製。馮宿上此奏的理由，不是針對雕版印刷這種形式，而是因為民間私下版印，有乖敬授之道這種現象。顯然在馮宿看來，如果由司天台獨家版印頒發，就是符合「敬授之道」的了。時憲書內容不多，需求的複本量極大，每年都需要更新，民間又有現成的雕版印刷的例子，這種情況下，再一份一份地抄寫頒發，顯然於理不合。所以唐太和年以後，司天台頒發的曆書很可能就是雕版印刷的了。如果這個分析成立，那麼，唐司天台當是我國古代最早從事刻書活動的中央機構之一。

二、五代的中央機構刻書活動

五代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動蕩分裂的時代。53年時間裏，北方梁、唐、晉、漢、周五代更迭；南方吳、吳越、前蜀、楚、閩、南漢、荊南（南平）、後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漢十國並存。這種混亂分裂、各據一方的局面，在我國歷史上是少見而特殊的現象。這個動亂時期，對於我國印刷事業發展史來說，卻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發展階段。正是在這個階段，萌發於唐代的雕版印刷技術由民間正式登堂入室，為政府所採納。政府指定專門的中央機構——國子監出面雕印了儒家經典，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儒家經典書籍的雕印本。從此，書籍製作方式由主要靠手寫開始轉入了雕版印刷階段。

後唐長興三年（932）國子監正式受命雕印「西京石經」。據宋王溥《五代會要》卷八經籍載：

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抄寫注出，仔細看讀。然後顧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需依所頒敕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其年四月，敕差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顥、路航、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紙。〔註6〕

從這段記載中可看出，後唐明宗李亶對國子監承刻經書的任務指示得非常詳

〔註5〕王彥，〈《唐語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56頁。

〔註6〕王溥，〈《五代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96頁。

細，不僅對使用什麼底本、由什麼機關組織人力執行作了明確的要求，還進一步指派專家學者如馬縞、陳觀、段頤、路航、田敏等充當詳勘官；不僅責成國子監選拔擅長書法的人以端楷寫出樣本，上板雕印，甚至還給刻字工人規定了每日雕印五紙的定額。一個割據一方的封建皇帝，對雕印經書一事關心得如此具體，足見這件事在其心目中的重要性。

敕令中所講的「西京石經」，指的是由唐鄭覃撰寫而刻之於京城長安的「開成石經」，又稱「唐石經」。刻石立於長安務本坊國子監太學，今在西安碑林。原刻《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孝經》、《論語》、《爾雅》十二種。另附《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凡 227 石。石經是國家給文人學子立定的讀經寫經的範本，代表了官方對儒家經典的理解。後唐中書門下當時奏請的是雕印九經，實際上主持工作的馮道刊刻了全部石經，其種數與《唐石經》正同。整個刊書工程起始於後唐長興三年（932），至後周廣順三年（953）雕成，前後歷時達 22 年。

值得稱道的是，在這次儒家經典的首次雕印過程中，先後經歷了四朝，這項文化工程並沒有因為政權更迭而中止，在馮道、田敏等人堅持不懈的努力下，終成其事。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裏，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的國子監能夠按照既定計劃，代代相傳，共同完成了一項文化事業，堪稱中國印刷史上的一件奇蹟。

後周顯德二年（955），國子監又刻印了《經典釋文》。

五代國子監的刻書活動對後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此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國子監都是歷代中央官刻的主要機構之一。

三、宋代的中央機構刻書活動

宋代是我國印刷事業發展的黃金時代，發源於唐代的印刷術經過最初階段由簡單到複雜的變化，至宋代已成為完善而成熟的技術。南北兩宋刻書之多、雕鏤之廣、規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寬，都是前所未有的。這其間除了跟宋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等因素有關外，也跟雕版印刷自身發展的條件日趨成熟有著莫大的關係。唐代的四川、兩浙等地民間的刻書事業給宋代刻書業的興盛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五代雖然政權更迭頻繁，但刻書事業由於得到統治者的重視而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所有這些，不但構成了宋代刻書事業大發展的前奏，而且從雕刻工人的培養、印刷力量